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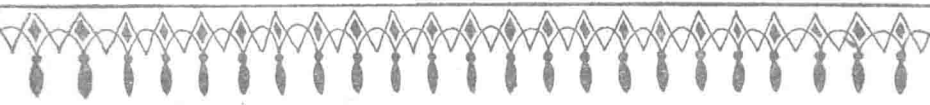
作家的童年丛书

我的童年



作家的童年丛书

我的童年



1

新蕾出版社

我的童年

《作家的童年》丛书①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12 字数150,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8,000

统一书号：R10213·22 定价：0.75元

作家的童年

茅盾

一九八〇年

元月

编者的话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的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个时代都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给我国历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更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很大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们更是欢欣鼓舞地迎接文艺的春天。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新作家崭露头角，争相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奋勇挥笔。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传播知识，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培养高尚情操的良师和好向导。少年儿童渴望了解作家走过的道路。无论是新作家、老作家，都曾有过不同的家庭生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经历了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每个作家的生活起点，都深深地印着作家自己的脚印：有叛逆旧社会的脚印，有寻求理想的脚印，有茹苦含辛或勤奋学习的脚印；有欢乐，有悲哀，有幸福，有梦幻……这些重重叠叠的脚印所踏出来的道路，也是作家追求光明与理想所走过的道路，它将会激励少年儿童热爱生活、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立志为实现“四化”而献身。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作家的童年》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编选反映我国现代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文章，每篇文章主要依靠作家本人撰写，一般用第一人称，如作家本人不能执笔，由他人撰写、整理者，也可用第三人称。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尽量做到文字通俗浅显。

丛书力求贯彻双百方针，文章的体裁包括故事、回忆录、报告文学、散文等，但要求史实准确可靠；内容应着重于记述作家童年或少年时代有意义的生活，或只写其中生动的片断；篇幅根据内容需要，可长可短，长文（五万字以上）可出专集，短文则出合集。

这套丛书的每篇文章前，都附有作家的照片、手迹、简历和主要著作，以使小读者们见人、见字，了解作家的历史和著作，读起他们的文章来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陆续出版。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文联、作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文联、作协分会的鼓励和支持；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所限，在编辑工作中不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新蕾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沫若童年	(5)
老舍的童年	舒 乙整理 (51)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给孙女的信	丁 玲 (73)
我的童年	冰 心 (87)
我的幼年生活	张天翼 (102)
皓首忆稚年 ——童年、少年生活掠影	臧克家 (111)
童年十忆	秦 牧 (130)
打碎牢笼 ——回忆我的童年	杨 沫 (147)
在记忆的海洋上漂荡 ——“我的探索”之一	柯 蓝 (159)

郭沫若的简历和主要著作

郭沫若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常用名郭鼎堂，笔名沫若，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沱、高汝鸿、谷人、羊易之等。出生于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卒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地主家庭出身。幼年受家塾教育，能诵《诗经》、《唐诗三百首》，喜读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等的文章。故乡的山水，破败的农村现实，影响了他的创作和爱国思想。一九〇〇年后，接受了富国强兵的思想。一九〇五年考进嘉定县高等小学，因带头闹学潮，曾被开除。在嘉定中学时，他读了不少外国翻译小说，并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有苦闷，但抱负尚在。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一九一四年春，赴日留学，同年秋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次年转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一九一八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先后接触了泰戈尔、歌德、海涅、席勒、莎士比亚、雪莱、惠特曼及北欧、法国、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哲学上受到泛神论的影响。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组织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夏社”，开始写诗，并从惠特曼那里找到了抒发他烈火般爱国感情的喷火口和喷火方式。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交，写下

了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不久，写了对旧道德予以无情抨击的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莹》。一九二一年回国，七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建立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刊《创造季刊》，从事新文学活动。稍后，回日本，一面学医，一面创作。一九二三年于帝国大学毕业后，回上海，断然弃医，专事文学，编辑《创造周报》和《洪水》。这时期有诗集：讴歌大自然的《星空》、爱情诗《瓶》和摆脱了泛神论，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前茅》，还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文学”的主张。一九二四年，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一九二五年结识了上海共产党的领导人，思想又有发展。一九二六年初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阴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伐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上海从事文艺活动。这时期的战斗诗作收在《恢复》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于一九二八年流亡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这十年，他写了极有价值的科学论文和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同时支持和指导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民族的生存奔走呼号，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主编《救亡日报》，出任军委政治部

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的黑暗年代里，他借古喻今，写下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六个大型历史剧和战斗的诗篇《战声集》。《屈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著作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斗志。一九四五年应邀访问苏联，写了《访苏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勇敢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上海和香港领导文化界同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这时期写回忆录《洪波曲》。一九四八年到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一九五一年曾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解放后他继续从事著述，先后出版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沫若诗词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专著《奴隶制时代》，文史论文《文史论集》，专论《李白与杜甫》等。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写了许多充满爱憎的著名诗篇，高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表达了亿万人民的

心声。一九七八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著名讲演《科学的春天》；逝世前不久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他还作了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热烈欢呼我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郭沫若从“五四”前夕到逝世，整整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斗争道路。他坚贞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生，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不仅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作家、诗人、戏剧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沫若童年

一

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①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面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①采光 见到阳光。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韩王庙，这所祀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象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事实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的人，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游戏过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

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時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的，日期是二十一还是二十七，我现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的经产妇，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一样。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母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璋，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的母亲是庶出^①，她的母

^①庶出 指妾所生，区别于妻所生。

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吧。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吧（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子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不曾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象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象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走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到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吧，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重的一个悲

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象弹词，但又不十分象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吧。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有时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

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筒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过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停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象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象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象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烛、三柱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子。——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痴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吧。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